

#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当代文学的道德批判

杨和平 熊元义

---

**内容摘要：**文学伦理学批评在把握创作自由和社会责任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强调了作家包括文学批评家的社会道德责任。文学伦理学批评因为看到文学能够帮助人完成择善弃恶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伦理选择过程，所以特别强调文学的教诲作用。中国当代文学在走向世界时却出现了搁置甚至放弃文学的道德批判的恶劣倾向。这种对道德批判的搁置甚至放弃存在三种方式：美学的方式、历史的方式和哲学的方式。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有力地抵制了当代文坛那些搁置甚至放弃文学的道德批判的倾向，而且促进了当代文学的道德批判的理论自觉，是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相适应的。

**关键词：**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的道德批判；理论自觉

**作者简介：**杨和平，文学博士，温州大学特聘教授，湖南师大特聘教授；熊元义，文学博士，文艺报社编审，内蒙古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发展论”【项目批号：14AA001】的阶段性成果。

---

**Titl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Moral Criticism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bstract:** Though acknowledg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freedom and social obligations in literary creation, critics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till attach vital importance to the social and moral responsibilities of literary critics. Appreciating the role of literature in helping man tell good from evil so as to make the right ethical selection and live a moral lif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lays particular stress on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literature. There has been a disappointing tendenc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o lay aside or even abandon moral criticism, a tendency which exists at aesthetic,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level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not only powerfully resists this tendency, but also arouses the moral awarenes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s, and thus sh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Key word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moral criticism in literature;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Authors:** Yang Heping, Ph.D. in Literature, is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and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Xiong Yuanyi, Ph.D. in Literature, is editor of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Art* (Beijing 100125, China) and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Email: aishange2008@163.com

---

在中国当代社会由模仿挪移阶段转向自主创新阶段之际，不少文学理论家不能与时俱进，不敢突破，而是搁置当代文学理论分歧，甚至限制和阻碍当代文学理论争鸣。而文艺

批评家聂珍钊则没有小成即安,而是积极解决当代文学理论分歧,勇于批驳一些流行的理论成见。2004年,在把握创作自由和社会责任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聂珍钊深入地探究了作家包括文学批评家的社会道德责任,提出了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

### 作家的社会道德责任不可推卸

20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文学界不是在把握创作自由和社会责任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追求创作自由,而是推卸作家包括文学批评家在社会分工中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片面强调创作自由。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则在把握创作自由和社会责任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尖锐地批判了那些片面追求创作自由的倾向,认为作家包括文学批评家不能缺乏社会道德责任。文学伦理学批评坚决反对把创作自由同社会责任对立起来,坚决反对狭隘把握作家包括文学批评家的社会责任,以为创作自由就可以不负社会责任,担负社会责任即没有创作自由(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4)。这种批判不仅切中要害,而且相当深刻。有些作家包括文学批评家之所以片面追求创作自由,是因为他们割裂了创作自由与社会责任的辩证关系。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有些作家包括文学批评家在抵制文学批评时提出:“在怎么活的问题上,没有应当怎样不应当怎样的模式,谁也不能强求谁。”<sup>①</sup>近二十年后,仍有作家在抵制文学批评时认为:“大千世界,人各有志,每个人都有权力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入世方式,作家从来就不是别样人物,把作家的地位抬举得太高是对作家的伤害——其实在中国,作家的高尚地位,基本上是某些作家的自大幻想。”<sup>②</sup>这些作家包括文学批评家在抵制文学批评时强调了选择的自由,但却忽视了人在自由选择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这至少是对20世纪法国哲学家和文学家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的肢解。萨特指出,人就是人。这不仅说它使自己认为的那样,而且也是他愿意成为的那样——是他(从无到有)从不存在到存在之后愿意成为的那样。人除了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什么都不是。但是,人要对自己是怎样的人负责。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篇著名论文中指出:“只要我承担责任,我就非得同时把别人的自由当作自己的自由追求不可。我不能把自由当作我的目的,除非我把别人的自由同样当作自己的目的”(27)。萨特认为,当我们说人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并不是指他仅仅对自己的个性负责,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所以,“人在为自己作出选择时,也为所有的人作出选择。因为实际上,人为了把自己造成他愿意成为的那种人而可能采取的一切行动中,没有一个行动不是同时在创造一个他认为自己应当如此的人的形象。在这一形象或那一形象之间作出选择的同时,他也就肯定了所选择的形象的价值;因为我们不能选择更坏的”。在萨特看来,“我们选择的总是更好的;而且对我们说来,如果不是对大家都是更好的,那还有什么更好的呢?”(8-9)因此,作家包括文学批评家的自由选择绝不能推卸他们在社会分工中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在把握创作自由与社会责任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了作家包括文学批评家的社会道德责任。文学伦理学批评尖锐地批判了当代文坛那些搁置甚至放弃文学的道德批判的偏向,认为作家包括文学批评家的社会道德责任是不可或缺的。聂珍钊尖锐地提出:“任何创作与批评都必须承担道德责任。作家有创作和虚构的自由,批评家有批评和解释的自由,但是不能违背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应该有益道德而不能有伤风化。文学教唆犯罪或损害道德是不能被允许的,批评家仅仅把这些看成艺术虚构和艺术审美是不负责任的。无论作家创作作品还是批评家批评作品,都不能违背文学的伦理和损害道德。

因此，文学批评绝不能在由竞争法则主导的文学市场里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相反，它应该用更严格的批评维护文学市场的伦理秩序和道德规范”（《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5）。这种对作家包括文学批评家的社会道德责任的强调有助于扭转那些搁置甚至放弃文学的道德批判的偏向。不过，作家包括文学批评家的社会责任却不仅有社会道德责任，而且有其他社会责任。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统治阶级中间的分工时不但深刻地指出思想家包括作家在这种社会分工中的社会角色，而且深刻地指出这些思想家包括作家在这种社会分工中的社会责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分工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幻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并且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这个阶级的积极成员，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1：99）。这就是说，思想家包括作家是从事精神劳动的，不仅从属于他所属的阶级，而且积极编造这个阶级的幻想和思想。而这些思想和幻想则不仅仅是社会道德。因此，这些参与编造他们所属阶级的幻想和思想的家包括文学批评家不但要明白他们的社会角色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即不是高人一等的，而且不能忘记他们在这种社会分工中的社会责任。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指出，“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1：99）。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把统治阶级的思想与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认为这是使统治阶级的思想独立化。马克思、恩格斯深入地批判了这种统治阶级的思想独立化的严重后果，认为这是社会虚假意识形态产生的思想根源。这就是说，作家包括文学批评家参与编造他们所属阶级的幻想和思想不仅仅是社会道德，因而他们在这种社会分工中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社会道德责任。不过，虽然文学伦理学批评没有从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社会分工中把握作家包括文学批评家的社会责任，但却从人的发展中把握了作家包括文学批评家的社会道德责任。这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在对人的认识上的发展。

在把握人类发展的基础上，文学伦理学批评深入地把握了人的基本特点即在人的身上善恶共存的特点，认为“无论是社会中的人，还是文学作品中的，都是作为一个斯芬克斯因子存在”。这种“斯芬克斯因子”由两部分组成的：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这两种因子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人。在人的身上，这两种因子缺一不可，但是其中人性因子是高级因子，兽性因子是低级因子。而人同兽的区别就是前者能够控制后者（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38）。文学伦理学批评这种对人的发展的把握，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刘再复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论相比，看似有些类似，实则根本不同。文学伦理学批评虽然认为人是作为一个斯芬克斯因子存在的即在人身上是善恶共存的，但却强调人同兽的区别，强调人身上的人性因子对兽性因子的控制。也就是说，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论是将人身上的兽性因子释放出来，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则推动人身上的人性因子对兽性因子的控制即择善弃恶，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这不但符合美善战胜丑恶的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而且是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相适应的，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中国当代文艺的健康发展。

### 文学应该引人择善弃恶

文学伦理学批评正是因为看到文学能够帮助人完成择善弃恶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所以特别强调文学的教诲作用，认为“文学的功能有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基本功能只能是教诲功能”（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论文学的基本功能和核心价值”9）。在文学的

审美功能与文学的教诲功能的关系上,文学伦理学批评坚决反对文学的基本功能是审美功能,文学的基本价值是审美价值,而是认为“文学的审美功能则只是文学教诲功能的衍生产物,是为教诲功能服务的”(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142)。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文学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为人类提供娱乐,而在于以娱乐的形式为人类提供教诲,的确有利于克服当代文化艺术界“过度娱乐化”的偏向。但应看到,即使文学的基本功能是文学的教诲功能而不是文学的审美功能,也将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生变化,而不是固定不变的。中国现代作家鲁迅在杂文“小品文的危机”中区分了不同的小品文,不仅认为那种小巧玲珑的“小摆设”虽然是“艺术品”,与万里长城、丈八佛像等宏伟的大建筑却无法相比,而且认为身处风沙扑面、虎狼成群之境的人所要的是坚固而伟大的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锋利而结实的匕首和投枪,而不是那种由粗暴而变为风雅的“小摆设”(鲁迅 4: 575-577)。而在和平时期即所谓“天平盛世”,文学的审美作用、娱乐作用就比较突出。有的作家明确地指出:“如果我们追求的是安定团结,就要创造一个歌舞升平的局面,就不能把歌舞里面搞得火药味十足,好像不知道还要跟谁斗一场”(王蒙 456)。不过,有些当代文学作品在强化和突出文学的审美娱乐功能时,却排斥了文学的其他功能,即这些当代文学作品将文学的情感升华、道义和道德的教化功能大大压制,而将官能娱乐的功能大大强化,如娱乐感官、娱乐好奇心、娱乐窥视欲等等。18世纪末期,席勒在区分艺术的庸俗的表现和高尚的表现时深刻地指出:“表现单纯的热情(不论是肉欲的还是痛苦的)而不表现超感觉的反抗力量,叫做庸俗的表现,相反的表现叫做高尚的表现”(152)。中国当代文学在片面追求单纯娱乐时就大量出现了这种艺术的庸俗表现。有些作家纯粹为了娱乐,脱离历史胡编乱造,甚至肆意歪曲历史;有些作家在表现一些满足生理需要的东西时格外夸张,甚至不少细腻描写成为游离部分;有些作家不是开掘沉重生活的有生命力有价值的东西,而是完全再现犯罪过程或近于暴露个人隐私;有些作家甚至有意无意地添加一些恶俗笑料和噱头,而这些恶俗笑料和噱头正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批判的,它满足和迎合人们心灵的那个低贱部分,养肥了这个低贱部分。

席勒虽然认为作家艺术家可能庸俗地处理自己的对象和卓越地处理他的对象,但却仍然认为伟大的东西和渺小的东西是客观存在的。而聂珍钊则认为美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聂珍钊强调:“至于文学的美,就审美而言它并非是先验存在的,而是审美的结果”,“没有审美,则没有美。美是事物的一种非物质属性。事物是先验的、客观存在的,而美是非先验的、主观的。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是一种主观心理判断,因此通过审美而得到的美必然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重要的是,美在同审美的关系中,审美是因,美是结果,因此审美同美是两个相互联系但内涵完全不同的概念”(“文学伦理学批评:论文学的基本功能和核心价值”10)。美绝不是主观审美的结果。马克思曾尖锐地指出,劳动产品的美虽然是工人劳动生产的,但却被他人享受。在异化劳动中,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这种工人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是一种痛苦,但却给他人带来享受和生活乐趣(马克思 恩格斯 1: 43, 49)。在这种异化劳动中,美和审美是分开的。因而,美不是审美的结果。如果文学作品的美取决于审美主体,那么,作家就可以推卸自己的社会责任,甚至可以蜷缩在自我世界里挖掘内心隐秘和自我臆测幻想。那种过于夸大文学批评家对文学作品的阐释作用的论调,就助长了有些作家不是在文学创作上精益求精而是在炒作上费尽心机的不良习气。在杂文“小品文的危机”中,鲁迅在区分“杀出血路”的小品文与“躲避时事”的“小摆设”的基础上认为,这两种小品文都能给人愉快和休息,但是,“躲避时事”的“小



摆设”将粗犷的人心磨得平滑即由粗暴而变为风雅，是抚慰与麻痹，而“杀出血路”的小品文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是休养（4：575-577）。这两种小品文的根本不同绝不是接受主体决定的，而是小品文的内在特质决定的。“杀出血路”的小品文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是生存的小品文；而“躲避时事”的“小摆设”则是作家在“白色恐怖”笼罩下苟全性命的产物，是小品文的末途。这就是说，即使文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借助教诲的功能帮助人完成择善弃恶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也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做到的。即使能够做到的，也有程度差异。因而，文学作品的美是客观存在的。

其实，聂珍钊在文学批评中并不否认文学作品的美是客观存在的。他坚决反对肢解文学作品，要求挖掘蕴藏在文学作品中的道德教诲价值，明确地认为，审美主体所获得的愉悦的审美感受是文学作品带来的。<sup>⑤</sup>聂珍钊对《哈姆雷特》的解剖就不是总结自己的审美感受，而是挖掘出其中所蕴涵的伦理价值。聂珍钊认为，《哈姆雷特》在道德批评看来，一是性格悲剧，一是恋母情结；而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看来则是伦理悲剧。在聂珍钊看来，在《哈姆雷特》中，老国王同哈姆雷特是父子关系，新国王同哈姆雷特是新的父子关系。新国王劝说为父亲的死而悲伤不已的哈姆雷特：我请你抛弃了这种无益的悲伤，把我当作你的父亲；我要给你的尊荣和恩宠，不亚于一个最慈爱的父亲之于他的儿子。新国王克劳狄斯企图在他同哈姆雷特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伦理关系，这就是要哈姆雷特“把我当作你的父亲”，继承他的王位。因而，哈姆雷特无法解决在复仇过程中所遭遇到的伦理困境，因为如果复仇他就可能犯下弑父、弑君和弑母的乱伦大罪，而如果放弃复仇则又不能履行他为父复仇的伦理义务与责任。这种伦理两难困境最终导致哈姆雷特的悲剧（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130-133）。显然，哈姆雷特的悲剧是客观存在的。不过，聂珍钊所设置的哈姆雷特的伦理两难困境却并不存在。因为哈姆雷特始终没有认可他和继父克劳狄斯新的父子关系即没有认贼作父，而是不断逼迫克劳狄斯犯罪。哈姆雷特对霍拉旭说：克劳狄斯“杀死了我的父王，奸污了我的母亲，篡夺了我的嗣位的权利，用这种诡计谋害我的生命，凭良心说我是不是应该亲手向他复仇雪恨？上天会不会嘉许我替世上剪除了这一个戕害天性的蠹贼，不让他继续为非作恶？”（莎士比亚 181）哈姆雷特对继父克劳狄斯的这种仇恨是贯穿始终的。无独有偶，哈姆雷特有两个父亲，中国元代杂剧《赵氏孤儿》的赵氏孤儿赵武也有两个父亲。赵武在复仇上是义无反顾的，最终杀死养父屠岸贾；哈姆雷特在复仇上虽有“延宕”，但最终还是用涂着毒药的剑杀死继父克劳狄斯。2007年，我们在解剖哈姆雷特的“延宕”时认为，哈姆雷特的“延宕”是由他复仇的特殊对象和特殊环境所决定的。哈姆雷特复仇是很容易的，但是，这种复仇既要是正义的，又要不伤害母亲。这样，哈姆雷特就不能鲁莽行事，而是寻找最佳时机。不管怎样，哈姆雷特的叔父克劳狄斯现在是国王，他的罪恶世人并不知晓。刺杀国王，无论如何，荣誉都会受到损害。哈姆雷特要求霍拉旭苟活下去，就是害怕世人如果不明白一切事情的真相。看来，即使克劳狄斯罪有应得，但世人仍然是受蒙蔽的，所以，哈姆雷特也不能不有所顾虑。至于母亲，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说：“无论怎样进行复仇，你的行事必须光明磊落，更不可对你的母亲有什么不利的图谋，她自会受到上天的裁判，和她自己内心中的荆棘的刺戳”（莎士比亚 105）。哈姆雷特在复仇中不但要让母亲认识到叔父阴谋的真相，也要促使母亲良心的觉醒。在哈姆雷特的启发下，王后乔特鲁德觉悟了，不但看到了自己灵魂的深处，看见灵魂里那些洗拭不去的黑色的污点，她的心也被劈为两半，丢掉了那坏的一半，保留了那好的一半（熊元义 375-379）。因此，哈姆雷特没有认贼作父，后人岂能反认他乡为故乡？

### 当代文学放弃道德批判的恶劣倾向

在强调作家包括文学批评家的社会道德责任的同时,文学伦理学批评坚决抵制当代文学的堕落即用物质欲望取代道德追求,坚决反对当代文坛那些搁置甚至放弃文学的道德批判的倾向。本来,在人类文学史上,优秀的作家包括文学批评家都是相当重视文学的道德批判的。文学理论家陈涌曾精辟地解剖过文学的道德批判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陈涌认为,优秀的作家艺术家不但有敏锐的正确的的美感,而且善于从道德层面上批判地观察自己时代的社会生活(372)。陈涌虽然批判了俄国作家果戈理在政治层面上的局限,但却高度肯定了他从道德层面上对地主阶级的揭露。一位并不打算从根本上否定过去的剥削和压迫制度的作家艺术家,也可能从道德层面上揭发、批判剥削和压迫制度对人的残暴,对人性的毁灭。果戈理所写的地主阶级的人物,看似无害,但精神极度空虚、贫乏、贪婪、吝啬、丑陋,而这些,又都是地主阶级的实际地位的必然产物,因而对它说来是本质的,以致人们不可能不从心底里鄙弃这些人间废物,以及养育这些废物的封建制度。陈涌还有力地针砭了中国现代作家沈从文在文学创作上的缺陷。陈涌认为,沈从文缺少像果戈理、鲁迅、曹禺那种强烈的道德感。在小说《雪晴》中,沈从文虽然相当细致地描写了一个寡妇接受“沉潭”这个极端野蛮残酷的处罚的过程,但对这种非人所能忍受的人民苦难,缺少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缺少由于强烈的道德感所激发的激情,而这正是鲁迅、曹禺,也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那里经常表现得异常突出的(陈涌 172-174)。但是,中国当代文学在走向世界时,却出现了搁置甚至放弃文学的道德批判的恶劣倾向。

中国当代文学对道德批判的搁置甚至放弃存在三种方式:美学的方式、历史的方式和哲学的方式。一是中国当代文学从审美层面上搁置甚至放弃道德批判。有些文学批评家提出应当把审美理想与道德理想区别开来,认为审美判断与道德判断很不相同。文学理论家刘再复明确地说:文学批评家最不足取的是仅仅用道德家的眼光去审视文学形象。“对文学作品中的性格,我们的观察的确需要一种开放性的审美眼光。所谓开放性,就是应当超越狭隘的、封闭式的世俗眼光。例如,在一般道德范围内,惩恶劝善的眼光是合理的,但是,在审美范围内,如果还仅仅是这样的眼光,那就势必要求文学作品中的种种人物要么是善,要么是恶,非此即彼,可是,这样人物形象就会变成抽象的寓言作品。而开放性的审美眼光,则要求作家和批评家既站在现实的地上,又要站在比现实更高的审美观察点上,把人看成审美对象。一旦将人看成审美对象,那么不管是什么人,其内心世界都可以具有审美意义”(刘再复 495)。刘再复提出的“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就是超越了真正的道德判断。所谓的“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概括地说,就是“任何一个人,不管性格多么复杂,都是相反两极所构成的。这种正反的两极,从生物的进化角度看,有保留动物原始需求的动物性一极,有超越动物性特征的社会性一极,从而构成所谓‘灵与肉’的矛盾;从个人与人类社会总体的关系来看,有适于社会前进要求的肯定性的一极,又有不适应社会前进要求的否定性的一极;从人的伦理角度来看,有善的一极,也有恶的一极;从人的社会实践角度来看,有真的一极,也有假的一极;从人的审美角度来看,有美的一极,也有丑的一极。此外,还可以从其他角度展示悲与喜、刚与柔、粗与细、崇高与滑稽等等的性格两极的矛盾运动。任何性格,任何心理状态,都是上述两极内容按照一定的结构方式进行组合的表现。性格的二重组合,就是性格两极的排列组合。或者说,是性格世界中正反两大脉络对立统一的联系”(刘再复 60-61)。即使到了21世纪初,仍然有人认为,

道德过去不是，现在更不是文学的救命稻草。恰恰是在道德终止的地方，美学产生了作用。他们强烈反对在艺术世界中进行真正的道德批判。这实际上是在艺术世界中肯定邪恶或者邪恶势力的合理存在，并为新兴中产阶级的理想人物争取合法存在。

二是中国当代文学从历史层面上搁置甚至放弃道德批判。有些美学家认为人类历史发展曾以“恶”为表现形式是必然的和普遍的。美学家李泽厚认为：“历史的前进体现了二律背反。例如一方面，历史上的战争死了很多很多人；另一方面，战争也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在人类社会中，有些残酷的行为却常常推动历史的前进。彼得大帝的改革，使多少人头落地。马克思也讲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多么残忍。我不赞成以人道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那是肤浅和错误的。因为历史有时候并不是那么人道的，特别是古代，需要通过战争，需要通过残酷的掠夺，才能发展，历史本身就是这样。所以说是二律背反”（《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421）。李泽厚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所谓“历史与感情的‘二律背反’”的思想。刘再复发挥了李泽厚的这个思想，认为：“情欲进入社会历史范畴之后，处于不同的系统，可以显示出完全不同的价值，二重组合之所以极其复杂，其原因就在这里。简单地把性格的二重组合视为固定化的善恶的线性排列，其错误也在这里。我们仍以贪欲为例，前面已说过，人对权力、地位、金钱的占有欲，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中具有不同的性质。在道德系统中，它表现为邪恶，而在历史动力系统中，它又表现为进步。”这就是“本来在道德范围内的恶——贪欲和权势欲，在历史动力的范围里则表现为善——进步作用。正视这种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的矛盾，正视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的矛盾，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彻底性的一种表现”（刘再复 451-452）。李泽厚还提出了情感本体论这种典型的政治与艺术的二元论思想。李泽厚说：“历史总是在矛盾中前进。情感的、伦理的东西与政治的东西在不同的层面起作用，有些时候两者协调发展相互促进，但有的时候，两者的矛盾和冲突又很激烈。”即“追求社会正义，这是伦理主义的目标，但是，许多东西在伦理主义的范围里是合理的，在历史主义范围里并不合理。例如，反对贫富不均的要求，也就是平均主义的要求，在伦理主义的范围里是合理的，但在历史主义的范围里就不合理了”（《世纪新梦》417-418）。这种政治与艺术的二元论在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同时，不仅容忍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丑恶历史，而且将这种丑恶历史发展普遍化，认为这是中国当代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

三是中国当代文学从哲学层面上搁置甚至放弃道德批判。有些作家为了肯定“痞子”作家或“流氓”作家，提出了粗鄙存在观。1993年，作家王蒙将王朔的创作倾向概括为躲避崇高并做了高度肯定。王蒙认为，所谓躲避崇高，就是回避价值判断，就是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恶丑，乃至不大承认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区别。这种躲避崇高论认为，首先是生活褻渎了神圣，其次才有王朔。王朔撕破了一些伪崇高的假面。躲避崇高虽然是对个别作家创作倾向的把握，但是在相当程度上概括了一些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的价值取向。在抵制文学批评时，王蒙还提出了粗鄙存在观。这种粗鄙存在观认为，寻找或建立一种中国式的人文精神的前提是对于人的承认。具体的人也是人，这就如白马也是马。坚持白马非马的高论与坚持具体的人不是（抽象的）人如出一辙。从这个意义上说“痞子”或被认为是痞子或自己做痞状也仍然是人。有真痞子也有佯痞子，正像有真崇高也有伪崇高。动不动把某些人排除于“人”之外，这未免太缺少人文精神了。如果真的致力于人文精神的寻找与建设，恐怕应该从承认人的存在做起。<sup>④</sup>这种粗鄙存在观不过是重弹存在就是合理的老调。黑格尔尖锐地指出：“‘自由的人’是不嫉妒的，他乐于承认一切伟大的和崇



高的,并且欢迎它们的存在”(31)。而人类绝对的和崇高的使命就在于他知道什么是善和什么是恶,他的使命便是他的鉴别善恶的能力。黑格尔指出:“人类绝对的和崇高的使命,就在于他知道什么是善和什么是恶,他的使命便是他的鉴别善恶的能力。总而言之,人类对于道德要负责的,不但对恶负责,对善也要负责;不仅仅对于一个特殊事物负责,对于一切事物负责,而且对于附属于他的个人自由的善和恶也要负责。只有禽兽才是真正天真的”(34)。显然,躲避崇高论漠视了这种价值高下的判断,放弃了人类绝对的和崇高的使命,它不是追求更好的,而是肯定更坏的。也就是说,躲避崇高论放弃了对社会进步的追求,放弃了对人的尊严和理想的捍卫。有人认为,要求作家人人成为样板,其结果只能是消灭大部分作家。这种典型的粗鄙存在观只承认人的存在,否认了人的发展和超越。这种粗鄙存在观反对虚无存在观否定多样的存在是合理的,但是,它反对多样的存在见贤思齐,就是十分荒谬的。这种粗鄙存在观不但充分肯定了邪恶或邪恶势力的存在,而且极力抵制当代文艺批评界对这些邪恶或邪恶势力的批判。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文学的道德批判被搁置甚至放弃,文学界出现了半个世纪前匈牙利现代文艺批评家卢卡契所批评的反常、病态的艺术现象。1952年,卢卡契在批评没落阶级的反常、病态艺术时指出:崇高的精神力量让位于本能,躯体越来越支配头脑。“这种过程在文学中是以与表现现实的、完全的,即社会性的人相对立的赤裸裸心理主义为开始的,并逐渐把人变成一堆不成形的生物,或是由松散的不受约束的团体所构成的一条没有河岸的河流,而最终为的是把人所具有的心理上和道德上的任何一种限定、任何一种方向和任何一种固定都剥夺掉了。在这种土地上生长了纪德的虚无主义,《地粮》的道德:‘行动,毋需断定你所做的是好的还是坏的;去爱,毋需不安,不管你爱的是美好的还是丑恶的。’这样爱就变成了赤裸裸的情欲,情欲就变成了纯粹的性欲,而最终这种性欲甚至堕落为一种地道的生殖器崇拜”(卢卡契 449)。卢卡契认为这种反常、病态艺术并不在于对病态的描写,而完全在于判断标准的颠倒。由于判断尺度的颠倒,最重要的标志就成了这样:渺小被当成伟大,歪曲竟成了和谐,病态的被当作正常,垂死的和死亡的被作为生命的法则。这样一来,艺术最重要的精神和道德基础就丧失了。有些中国当代作家也由“个人写作”变成“私人写作”,从“身体写作”降落到“下半身写作”,即“回到一种原始的、动物性的冲动状态”。不少文学批评家不仅有力地批判了20世纪后期中国文坛盛行起来的卢卡契所批评的反常、病态的艺术现象,而且在区别不同的文学的道德批判的基础上推进了文学的道德批判的深入发展。这就是他们深入批判的抽象的道德批判。

### 当代文坛对放弃道德批判的倾向的批判

有些文学批评家虽然推崇并贩卖所谓的历史进步与道德进步的二律背反论,但却力求“鱼”和“熊掌”兼得,提出了文学的“悖论”,认为这不仅是社会生活的悖论即这种“悖论”是社会生活的本真的真实,而且是文学的悖论即只有写出这种“悖论”,才是好的文学作品。因而,他们高度肯定了那些无力解决历史观与价值观矛盾的文学作品。这显然是违背文学发展规律的。有些文学批评家虽然看到中国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负面的东西,但却认为这些都是中国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快速发展的伴随物,是不可避免的。而一些作家深受到这种不可避免论的影响,在文学创作中不仅对中国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出现的各种不平等、不公平的、不人道的消极现象的批判羞羞答答,既不坚决,也不彻底,而且对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人类未来发展产生了困惑。这种不可避免论暴露了这些文学批评家在理论上的不



彻底，即他们的历史观与价值观是矛盾的。历史观与价值观从根本上是统一的。有些文学批评家之所以出现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矛盾，是因为他们在历史观上不够彻底，以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因而认为历史发展必然伴随邪恶横行。其实，恶绝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本身，不过是历史发展的表现形式。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而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本身。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说得十分清楚：“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马克思 恩格斯 4：237）。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恩格斯和黑格尔没有根本的区别。他们的区别在于，黑格尔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恩格斯则从历史本身寻找这种动力。因而，恶绝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本身，而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就是说，历史发展的动力既然可能以恶为表现形式，那么，也可能以善为表现形式。马克思正是在深刻地把握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基础上，高度科学地概括了历史发展的两条道路，一是采取较残酷的形式，一是采取较人道的形式。马克思说：“正像 18 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19 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在英国，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它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大陆。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所以，撇开较高尚的动机，现在的统治阶级的切身利益也要求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的障碍除去”（马克思 恩格斯 2：101）。这就是说，历史的发展采取较残酷的形式符合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采取较人道的形式则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社会的全面进步，是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的统一，理应采取较人道的形式。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在历史的变革和社会的转型时期出现一些采取较残酷的形式的现象则是邪路。因而，优秀的文学批评家绝不能容忍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在历史的变革和社会的转型时期出现一些采取较残酷的形式的现象。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些畸形发展不仅是精神倒退，而且是历史倒退。优秀的文艺批评家对这些畸形发展既要道德批判，也要上升到历史批判，并将这种道德批判和历史批判有机结合起来。

文学伦理学批评虽然没有强调文学的道德批判是不能脱离历史批判的，但却坚决反对当代文坛那些搁置甚至放弃文学的道德批判的倾向，积极支持那些与历史批判有机统一的当代文学的道德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代文学的道德批判的理论自觉。这有助于中国当代社会全面进步。

### 注解【Notes】

①王朔等：“选择的自由与文化态势”，《上海文学》1994 年第 4 期。

②莫言：“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意义——在中澳文学论坛上的发言”，《文艺报》2013 年 4 月 12 日。

③参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9，103，140。

④参见王蒙：“躲避崇高”、“人文精神问题偶感”等文，《世纪之交的冲撞——王蒙现象争鸣录》，丁东 孙珉选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 年）。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陈涌：《陈涌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年。

[Chen Yong. *Selected Essays on Literary Criticism by Chen Yo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9.]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rans. Wang Zaoshi.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01.]

李泽厚：《世纪新梦》。合肥：安徽文学出版社，1998年。

[Li Zehou. *New Dreams in New Century*. Hefei: Anhui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8.]

——：《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 Essays of Li Zehou*. Changsha: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5.]

刘再复：《性格组合论》。合肥：安徽文学出版社，1999年。

[Liu Zaifu. *On the Combination of Character Traits*. Hefei: Anhui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9.]

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高中甫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Luacs, Georg. *The Literary Essays of Georg Luacs*. Vol. 1. Trans. Gao Zhongfu, et al.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80.]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Lu Xun.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Vol. 4.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1.]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Marx, Karl, and Engels. *The 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Trans. and ed. The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of 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s Works,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5.]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文学伦理学批评：论文学的基本功能和核心价值”，《外国文学研究》4(2014): 8-13。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On Fundamental Function and Core Value of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4 (2014): 8-13.]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 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

[Sartre, Jean-Paul. *Existentialism is a Humanism*. Trans. Zhou Xuliang and Tang Yongkuan.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88.]

席勒：《席勒美学文集》，张玉能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Schiller, 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Aesthetic Essays by Schiller*. Trans. Zhang Yuneng.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1.]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悲剧集》，朱生豪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Shakespeare, William. *A Collection of Shakespeare's Tragedies*. Trans. Zhu Shenghao. Beijing: Beijing Yanshan Press, 2000.]

王蒙：《王蒙文存》第2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

[Wang Meng. *The Complete Works of Wang Meng*. Vol. 23.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3.]

熊元义：《文艺批评的理论反思》。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年。

[Xiong Yuanyi.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Academy Press, 2013.]

责任编辑：何 年